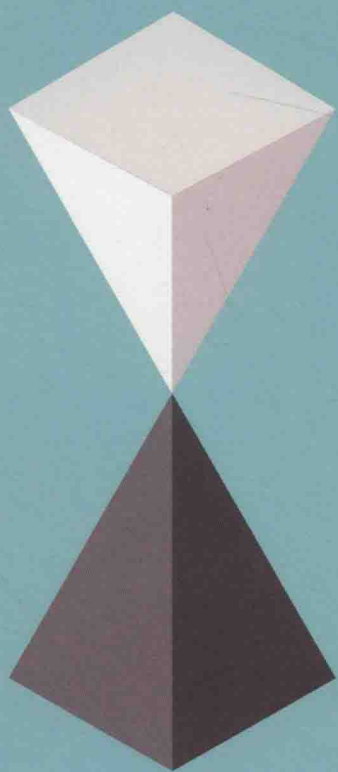


培文通识
大讲堂

中國論衡

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
与新十大关系

王曙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海外
精英

培文通识
大讲堂

中國 論 衡

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
与新十大关系

王曙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新十大关系 / 王曙光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

（培文通识大讲堂）

ISBN 978-7-301-29574-8

I . ①中… II . ①王… III .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 ①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2566 号

- | | |
|-------|---|
| 书 名 | 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新十大关系
ZHONGGUO LUNHENG |
| 著作责任者 | 王曙光 著 |
| 责任编辑 | 于铁红 周彬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574-8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60毫米×960毫米 16开本 20印张 245千字 |
| |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9.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自序 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中国未来 / 1

第一章 论新十大关系

-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9
- 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14
- 三、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 18
- 四、国企与民企的关系 / 23
- 五、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 / 29
- 六、东部与西部的关系 / 35
- 七、富裕与贫困的关系 / 41
- 八、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 44
- 九、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48
- 十、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关系 / 54
- 结束语 / 60

第二章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 一、引言：对经济体制变迁的不同模式的反省 / 63
- 二、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起点与基本条件 / 67

- 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和传统智慧 / 78
- 四、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若干检讨和未来方向探讨 / 82

第三章 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争议与变革

- 一、产业政策与国家角色：两次学术争议及其辨析 / 89
- 二、产业政策之国际视野：美国和日本 / 93
- 三、中国产业政策之检讨：效率与公平之争 / 99
- 四、中国农村银行业的转型与创新：政府和市场各自需要做些什么？ / 102

第四章 百年“国家—市场”宏观景观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

- 一、引言：国家与市场：百年宏观景观 / 106
- 二、国际上农村金融发展的历史阶段 / 112
- 三、中国农村金融的历史命运 / 115
- 四、中国农村金融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 / 120
- 五、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 / 127

第五章 中国扶贫开发战略转型：习近平扶贫思想研究

- 一、包容式（普惠式）增长、机会均等与赋权 / 131
- 二、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推动内生式扶贫，实现全面小康 / 137
- 三、实现精准脱贫，提高扶贫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 144

第六章 中国合作金融体系百年制度变迁与未来战略走向

- 一、发轫与彷徨：1918—1949，
合作金融体系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与经验教训 / 150
- 二、辉煌与异化：1949—1979，
工业化与赶超战略背景下的合作金融使命与体制特征 / 152
- 三、回归与前行：1979—2003，
经典主义合作金融与修正主义合作金融之争 / 155
- 四、颠覆与变革：2003—2018，
从大历史角度看合作金融体系全面改制的利弊得失 / 158
- 五、农村商业银行未来战略走向：
三个结构的深化完善和三个视角的创新 / 162
- 六、倔强生长：草根金融的生命力在何处？ / 165

第七章 放大格局看转型阵痛期的中国经济

- 一、如何理解当前宏观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和趋势？ / 166
- 二、知变守常：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与工匠精神 / 168
- 三、混合所有制构建的意义与民营企业的历史机遇 / 169
- 四、城乡一体化战略中的商业机遇 / 171
- 五、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把握机遇：义乌奇迹和沙县奇迹的启示 / 172

第八章 中国金融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 一、金融文化的三个层次 / 175
- 二、理解金融文化的两个维度 / 176
- 三、源远流长的中国金融文化：五个阶段 / 177

四、银行家精神和金融从业者的伦理文化建设 / 180

五、金融伦理与金融文化 / 182

六、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 / 183

七、走向世界的中国金融文化 / 185

第九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创新

一、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探讨与对“韦伯命题”的批判 / 188

二、先秦至今中国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大阶段 / 190

三、中国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的六大误区 / 196

四、在传承中创新：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未来 / 197

第十章 中国供销合作体系与供销合作银行：可行性、问题与定位

一、中国供销合作体系的由来和优势 / 199

二、中国供销合作体系在构建金融实践方面的劣势 / 201

三、未来供销合作银行不要走农村信用合作体系的老路和弯路 / 203

四、未来供销合作银行组建的三大核心定位 / 204

第十一章 中国乡村建设的使命与村社内置金融

一、乡村建设的愿力与使命 / 206

二、宏观形势判断和乡建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 207

三、村社内置金融的内涵 / 209

四、村社内置金融的三大功能 / 211

五、万物并育，和而不同：乡建事业应有的心态 / 212

第十二章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 一、农业文化遗产对农业发展的意义 / 214
- 二、诸暨人文历史概观 / 218
- 三、千年古榧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描述 / 220
- 四、诸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发展现状 / 225
- 五、诸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 227

第十三章 央企混改模式、股权结构与法人治理结构

- 一、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联通模式的意义 / 231
-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模式 / 233
- 三、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本质的变化在于内部治理结构 / 234
- 四、两种不同的混合所有制视角与两种不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 / 235
- 五、谨慎推进混改，绷紧国家安全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根弦 / 237
- 六、国企混改、员工持股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 / 238

第十四章 中国金融大趋势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创新发展

- 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与我国当前金融领域的成就和问题 / 240
- 二、我国中小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面临的问题 / 251
- 三、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机构未来创新与发展之路 / 256
- 四、结束语：稳健与创新并重，治理与文化共进 / 257

第十五章 边疆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建设和金融扶贫机制探讨

一、村镇银行企业文化、客户关系与边疆民族地区经营战略：

鄂温克包商村镇银行 / 260

二、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区金融特征与差异化监管 / 268

三、赤峰市：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的机制创新与转型 / 272

四、河北康保：金融扶贫的六位一体机制创新 / 273

五、乌兰察布市：金融机构风险控制、

政府信用和农信社管理体制变革 / 276

六、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制度创新、

信用体系建设与省联社变革 / 279

七、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降低牧区金融成本，

加大信用环境建设 / 282

八、包头市：高新银通村镇银行通往卓越之路及其面临的问题 / 285

九、鄂尔多斯乌审旗：生态建设、金融环境与机制创新 / 287

十、阿拉善：推进金融扶贫，化解金融机构风险 / 290

十一、银川：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的创新与出路 / 299

十二、总结：边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成就巨大，任重道远 / 300

后 记 / 307

自序

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中国未来

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是中国古代对于事物矛盾发展规律的特有的观念：事物矛盾的两面总是在不断消长和变化之中。《周易》的“易”，其中既指“简易”“不易”，亦有变易之意。事物内在矛盾既有“不易”的一面（事物的性质保持稳定、恒定和确定的一面），也有时刻保持动态变化的一面（事物），而且就其本质而言，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易”之中，未有绝对静止之时。中国人常说“知变守常”，其中“变易”是“变”，“不易”即“常”，“常”和“变”相伴而生。从最高意义上而言，“变”即是最本质的“常”，而“常”即是“变”本身。阴阳矛盾的互动造成了万事万物，其中所包含的道理极其简单易明，此谓之“简易”，即所谓“大道至简”也。

因此，从任何一个巨大的系统来看，动态平衡就是所有复杂事物内在的基本规律：就其稳定的一面来看，它应该保持一定的平衡，以维持其

性质的相对恒定性；而就其变易的一面来看，事物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动态的发展，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平衡与稳定。系统动态平衡，就是从一个复杂的、巨大的“大系统”角度出发，在事物的运动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既不是追求一种绝对的平衡（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绝对的平衡），绝对的平衡不但于事物发展不利，反而会使事物处于一种能量衰退的境况之中，丧失事物发展的活力、动力和势能；也不能追求一种绝对的不平衡，当事物处于绝对的不平衡的时候，如同摆动幅度过大而超过一定限度的钟摆一样，会使事物陷于崩溃状态，整个大系统的基本稳定就会难以维持，这个复杂系统就会进行自我的否定，丧失原有的性质，而不是发展。

因此，系统动态平衡理论所要追求的状态，是既要使事物保持一种相对的不平衡，以使事物充满活力、动力和势能，使事物自身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的动态发展状态之中，又要使事物本身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以保持整个事物的稳定，从不平衡走向新的更高级的平衡。因此，系统动态平衡理论强调的是：不过于追求平衡，过于平衡则亡；也不宜过于不平衡，过于不平衡亦亡。

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治大国若烹小鲜，不翻容易糊，乱翻容易散。因此黄老所有的治国智慧，在于教我们掌握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把握好这个动态平衡的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结构 and 经济结构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力度、强度也是极为罕见的，对中国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影响极为深远。制度层面的频繁变动，是整个系统具有巨大活力和动能的源泉，但同时也造成了系统的不稳定。然而要稳定是不是就不要变革了？恰恰相反，从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系统状态走向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系统状态，还要靠深刻的变革，这就是系统动态平衡理论的辩

证哲学的要义所在。

一个国家的大系统所包含的问题，无外乎有三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身的关系。我们可以透过这三大关系看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与变革及其影响。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今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议就大多涉及这个范畴，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争论，无不与此相关。要实现绿色发展，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在发展中保持人和自然的平衡与和谐，不能再以过大的生态代价来发展经济，这是我们在高速发展几十年后所获得的感悟。旧的发展观引发的环境危机、农业安全危机（化学农业所造成的农产品和食品危机）等已经危及民生，从长远来看更危及可持续发展和长期增长。人和自然不平衡了，人过多地剥夺了自然，过早地耗费了自然资源，现在人需要退一退，使人和自然的不平衡重新走向平衡。这就要求我们的增长模式实现变革，包括工业发展模式、农业发展模式、环境保护政策、资源利用机制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革，才能把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搞得和谐一些、平衡一些。当然这个平衡，要动态地获得，不要走极端，不要追求绝对化，还要兼顾一下其他变量，要照顾系统的整体稳定，要在动态发展中解决。

从人和人的关系来说，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贫困和富裕的关系以及扶贫问题、城乡问题、东西部问题、族群问题，乃至国企和民企关系问题，等等，本质上都是涉及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人和人的关系的不平衡，今天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系统稳定的大问题。这里面既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战略的调整问题，也有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的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人和人的关系基本平衡的社会，建立一个人和人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隔阂的

社会、撕裂的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关国家这个大系统的基本稳定，没有基本稳定，遑论发展？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对于发展极为有利，可以降低发展的成本，降低发展的社会代价（社会震荡成本和社会摩擦成本），甚至可以说，人和人关系的问题的解决，可以为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可以激发更多的需求，激发更多的发展动力。我们以往的发展得益于一定的不平衡，打破原来的僵化的平衡，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对的；现在我们要从系统稳定的视角出发，矫正过度不平衡带来的弊端，并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动态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发展动力。今天中国的反贫困力度的加大、效率和公平兼顾方针的提出、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口政策的改变等，都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努力，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所激发的国内需求和增长动力是无穷的。所以，人和人的关系解决得好，可以激发新潜能，释放新动力，形成新的改革红利，实现人和人的利益格局的再配置与再调整，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的长远稳定增长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人和自身的关系，是最深刻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一切和谐的基础。这个问题，涉及极为广泛而复杂的学科体系，甚至可以说，就人和自身的和谐这个主题而言，它可以调动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智慧，举凡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艺术、哲学、文学等，都在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人与自身的和谐，取决于人自身所具备的调整人与自我内心的一切矛盾的能力，使人处于一种均衡的、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体现为一个人的满足感、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以及自我成就感；与这种和谐的状态相反的，则是匮乏感、绝望感、丧失感、危机感和自我否定感。而人所有的积极的感觉，即人和自身的和谐感，既有赖于外部因素（包括可见的、物质的因素，也包括不可见的、社会关系的因

素)，也有赖于内部因素的支撑。就人的外部因素而言，人类的各种制度安排（养老制度、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甚至信贷制度、财政制度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都会影响人与自身的和谐程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幸福”这样的心理状态仅仅是一个人自己内心的事情，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其内心的幸福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自己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一个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社会资本（社会交往所带来的特殊资本）的人，是很难有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但是外部制度条件仅仅是一个人与自身和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事实是，很多人尽管具备优厚的外部条件，具备极高的物质条件、社会地位带来的巨大社会资本、极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等，但他仍然有可能是一个不具有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人。反之，有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优厚的外部条件，但却很可能是一个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强的人。这就涉及一个人与自身和谐的内部条件，这个内部条件的具备，主要有赖于一个人内心世界均衡性心理结构的建立。这个均衡性的强大的内部心理结构的建立，本质上也是社会教育（或古代称之为教化）的产物。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孔子的治国智慧：当他的弟子问他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地方时，他依序给出了三个答案：庶之、富之、教之。教化的功能，既有帮助人和人之间获得和谐关系的功能，更有帮助一个人获得稳定的均衡的内部心理结构的功能。“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这是治国的最难的部分，也是至为重要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教化传统、文化积淀、传统意识、人文记忆，其落脚点，实际上都是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和谐而服务的，此所谓立人之道、达人之道。富了就安了吗？富了就乐了吗？衣食足就知荣辱了吗？不见得。

中国正处在由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向一个“以均衡为导向

的社会”的转变之中。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从非均衡中汲取动力以保持平衡（就像我们前些年极为强调“保八”来维系整个社会的高速发展以避免社会危机）；而一个“以均衡为导向的社会”，是从均衡中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在这个新的时期，不仅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增长的模式发生了转换，人和人的利益关系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和自身的关系同样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个焦灼的、汲汲于发展的社会，逐渐转型为一个稳健的、追求社会“良治”和人类“良知”的社会；一个强调竞争的、丛林规则的、结果本位的社会，逐渐转型为一个强调公平的、法治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一个浮躁的、追求外在物质满足的、以财富和资本为中心的社会，逐渐转型为一个从容的、追求内在心灵满足的、以幸福和自我实现为中心的社会。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总方向、大趋势、大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金秋时节，《中国论衡》订毕，是为序。

2017年9月23日秋分

王曙光于善渊堂

第一章

论新十大关系^[1]

新中国在近 70 年的发展进程中，总体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无论是从全球比较的横向的视角，还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的维度，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可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可以视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个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新中国以无比的勇气，在经济发展体制方面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而赢得整个民族命运的转机。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重新回到大国经济角逐的核心，而且逐步赢得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回到康乾时代中国的位置，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强，且人均收入居

[1] 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12 月 8 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上的课堂讲录，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2017 年第 7 期。

于世界的前列。这个愿景，现在看来是非常真实的，而不是一个虚幻的目标。

在经济追赶和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当然中国走了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整体上看是成功的，但即便如此，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中国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形态的变化，这套发展模式也有着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必要。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不对我们以前的发展模式做出彻底的深刻的反思，我们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增长的可持续，甚至会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严重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复杂和历史超级漫长的大国，任何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实施都应该经过仔细的权衡，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需要极其慎重的考虑和极其高超的平衡术。

而中国在近 70 年的经济发展中，尤其在近 40 年来，“非均衡”成为一种典型的特征。这个不均衡，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有其制度和文化背景，是历史地形成的，不是可以轻易地改变的。非均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体制特征，当然也是一个文化特征。从绝对的意义来讲，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均衡的，经济总是在非均衡中寻找平衡，总是在非均衡的状态中实现发展。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就必然不是一个静态的平衡的状态，而这种理想的静态的均衡也永远不会实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动态的均衡，是在不均衡中逐步趋于均衡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从经济发展的机制层面来说，某些不均衡的存在也是必要的，不均衡才能激发活力，激发创新，创造各种机会，使得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就如同钟摆的摆动，如果左右力量完全均衡了，钟摆就不摆动了，也就失去了活力。但是钟摆也不可处于一种过度的不均衡中，它的不均衡要保持一个度，否则就难以维系其安全性和正常的运作。经济的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非均衡，不要对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一概以一种否定和